

姜国柱 著

张载的哲学





张载的哲学思想

姜国柱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张载的哲学思想

姜国柱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1/4

字数：203,000 印数：1—10,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90·47 定价：0.76元

序

张载(公元1020~1077年)是我国十一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唯物主义宇宙论气的一元论。他的《正蒙》一书,在批判道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方面是卓越的,在我国哲学史上的贡献是空前的,对以后的我国哲学家曾发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在张载的哲学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矛盾。如在自然观上,他一方面提出“太虚即气”,“气”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性”是“万物之一源”,“大其心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张载就在“气”之外,又有承认“心”、“性”的漏洞,因而本书认为张载是二元论的哲学家。由于张载这种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张载承认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的独立存在,结果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张载在认识论上,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经过一系列转折,竟然提出了“大心”,先天的体会天地万物,这又与程、朱一派唯心主义思想殊途同归。在方法论上,张载对于事物发展的学说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他既承认事物自己运动“莫或使之”,“动非自外”,又承认“神鼓万物而动”;既说“一物两体”,“欲一之而不能”,又说“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仇必和而解”,这就是从辩证法出发,又退回到形而上学。在人性论上,张载创立“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这里无疑是人性的二元论,与程、朱合流。本书作者认为张载是二元论的哲学家,是

我们进一步应当共同考虑的。由此可见，在道德观点和伦理观点上，张载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在被封建统治者几代推尊为理学之祖，儒家之宗，是有一定关系的。最后我们记得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过的一段话：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①

研究哲学史须要按照马克思的指导去研究。姜国柱同志研究中国哲学史，勤恳努力，这本书是他努力积年的结果，是成功的。

容肇祖

一九八一年七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

序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学术界有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张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者。也有的同志不这样看。姜国柱同志认为张载的哲学思想是二元论的。他搜集了大量材料，经过认真分析，更明确了自己的看法。细读他的这部著作，感到有论有据，不得不对他的结论表示心折。在学术史研究领域，百家争鸣是好事。十九世纪中叶，龚定庵就唾弃“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希望风雷激荡，生气蓬勃，可以说很有见识。姜国柱同志的文章引据资料，朴实说理，以此取信于人，应该得到鼓励。能否说姜国柱同志论述张载哲学思想，已经找到了最后的真理呢？不能这样说。只就我个人来说，我是赞同他的结论的。对这一点，书里讲得很详细，我就不多说了。

本书全面论述了张载的哲学思想，举凡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政治论，都讨论到了，见解很深刻。尤其对张载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分析，更是精辟，我很佩服。书里说：张载认为，《中庸》言“自诚明”与“自明诚”有异。“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书中引了张载的这段话之后，断定这是张载关于两种并行的认识途径的提法。这种提法是其二元论宇宙观在认识论上的反映。张载的这两种认识途径，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陆王心学抓住了他的自诚明加以引申和肿胀。程朱理学抓住了他的自明诚加以发挥和扩大。其最后结局，不论是尊德性也好，还是道问学也好，都不能摆脱唯心主义。这也是张载二元论的悲剧。读了上述这段理论分析，感到姜国柱同志不仅深刻理解了张载的“自诚明”与“自明诚”两种认识途径，还对沿着这两种认识途径而发展起来陆王心学“尊德性”与程朱理学“道问学”有了精深的论述。这是十分可喜的科学研究收获。

书里又论述了“两”与“一”的矛盾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说道：“张载认为，事物既是矛盾着的两个对立方面的‘两’，又是矛盾双方共居于一个统一体的‘一’。‘两’与‘一’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没有对立的两端相感，就没有统一体的‘一’相合，这就是‘二端，故有感’。同样，没有统一体中的‘一’相合，对立的两端相互作用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互不相干，永远不会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这就是‘本一，故能合’。因此他又说：‘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张载关于‘两’与‘一’、‘分’与‘合’的辩证法思想，是对中国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极好说明，同时又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这样分析和评价张载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比较恰当的。

书中对“关学”与“洛学”的关系，作了可贵的探索。论它们的同，也论它们的异。这种探索本身达到了一定深度，又为学术史源流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张载是一位影响较大的理学家。朱熹编选《近思录》，把年辈先于二程的张载排在二程之后，表明朱熹的一种衡量。然而这并不影响张载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程对张载是十分推崇的。程颐说：张载的《西铭》“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成为理学家的经典。重视这种客观事实，可能对张载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把

张载放在理学家的位置上来考察，是实事求是，并不含有贬低或无视张载唯物主义观点的意思。正如程朱继承《易传》而提出的具有无神论倾向的鬼神观点，也是不能抹杀的那样。

姜国柱同志，学风很踏实。他研究问题，先占有大量材料，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才下判断。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好学风。遍读《张载的哲学思想》这部著作的各个部分，都能得到这样的良好印象。通过姜国柱同志，我看到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踏实认真，勇于探索，有为学术研究而献身的决心和毅力。这肯定将使我国的社会科学日益繁荣起来。怀着激奋的心情写完这篇序文，我为姜国柱同志取得可喜的学术成就而祝贺。

邱汉生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容肇祖序·····	1
邱汉生序·····	1
一 张载的生平·····	1
二 张载的时代·····	9
(一) 张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9
(二) 张载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14
(三) 宋明理学的历史作用·····	18
(四) 张载哲学思想的实质·····	22
三 张载的宇宙观·····	24
(一) “太虚”“虚空”的涵义及由来·····	24
(二) “太虚即气”的唯物论·····	29
(三) “天人合一”的唯心论·····	34
(四) 张载对自然科学的探讨·····	53
四 张载的认识论·····	58
(一) 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59
(二)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61
(三) “上智下愚不移”的先验论·····	72
(四) 关于检验认识的标准·····	78
五 张载的辩证法·····	82
(一) 物质的特性是自己运动·····	83
(二) “一物两体”的矛盾学说·····	87
(三) 物质运动变化是有规律性的·····	93
(四) “神鼓”万物而动的外因论·····	98

(五) “仇必和而解”的矛盾调和论·····	104
六 张载的人性论·····	108
(一) “天地之性”的衍变·····	108
(二)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113
(三) 唯心主义的道德观·····	122
七 张载对佛道的批判·····	135
(一) 从本体论上的批判·····	136
(二) 对生死轮回说的批判·····	143
(三) 从认识论上的批判·····	145
(四) 批判的不彻底性·····	147
八 张载的政治思想·····	152
(一) 恢复井田制的政治主张·····	152
(二) 建立宗法制的封建统治·····	158
(三) 主张渐变的改良主义思想·····	165
九 “关学”与“洛学”·····	169
(一) 张载与二程的关系·····	170
(二) 张载的传人——吕大钧与吕大临·····	184
十 张载哲学思想的影响·····	195
(一) 张载思想与朱熹学说·····	197
(二) 张载思想与罗钦顺学说·····	217
(三) 张载思想与王廷相学说·····	227
(四) 张载思想与王夫之学说·····	238
(五) 张载思想与戴震学说·····	256
结束语·····	269

参考书目

重点参考书

后 记

一 张载的生平

张载是我国十一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并对以后的哲学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

张载，字子厚，宋朝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为家住在陕西郿县横渠镇，并曾在横渠镇讲学，所以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张载的弟子大多数是关中人，所以后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

张载的家族，原先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任给事中，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事，都是中小官吏。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此时，张载与弟张戡均尚年幼，无力返回老家大梁。因此，全家人便侨居在凤翔郿县横渠镇。

张载的少年时代，西夏常常侵略骚扰西北边境，宋朝政府派兵抵抗，互有胜负。当时由于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对于“慨然以功名自许”^①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以至后来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解除西夏对边境的侵扰。因此说他“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②。

张载二十一岁那年，宋王朝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

① 吕太临：《横渠先生行状》。下引简称《行状》。

② 《宋史·张载传》

延州知州。于是他上书谒范仲淹，建议对边境用兵。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①张载读了《中庸》之后，虽然十分喜爱，但是很不满足。于是他又读了许多“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②。可见，张载在研究哲学，探求知识，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在儒、道、佛三教中转来转去、摸索寻找。在张载的思想中，受儒、道、佛三教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是《周易》。王夫之说：

“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③

王夫之对张载思想的评价，代表了后来学者对张载思想的概括，这是符合实际的。从张载的著作，特别是从《横渠易说》中，可以看到他受《易》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三十八岁，考中进士。后来作过几任地方官。先任祁州的司法参军，丹州的云岩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等。张载作云岩县令时，十分重视改变社会风俗，培养社会道德，树立尊老事长的优良风尚。吕大临说：

“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

①②《行状》。

③《张子正蒙注序论》。

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①

由于张载的教育影响、积极提倡，使关中风俗为之大变，人民日益敦厚纯朴，社会道德日趋良好。他认为，对乡民百姓“有所教告”，单靠发布文告恐怕难以“尽达于民”，因此他经常把乡长们召集到县庭，“淳淳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其受命者”^②。

由于张载办事认真，政令严明，因此，他发出的“教告”，一般说来，全县的乡民百姓，连偏僻山村的妇女、儿童都能预先闻知。这就便于政令的推行。

熙宁初年，张载被任命为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在渭州，他与环庆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并且得到蔡挺的信任、尊重。军府政事，常常询问张载。张载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③。对于西夏入扰，张载尤为注意。他看到边境居民受到烧杀劫掠，加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极端贫困和悲惨生活，除了深表同情外，又“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④。张载的这些做法，对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痛苦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也说明他关心民间疾苦，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朝廷推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⑤宋神宗下令召见，询问他治理国家的方法，他“以渐复三代为对”^⑥。神宗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并说：“卿宜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⑦张载感谢地说：“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月，继有所献。”^⑧后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行状》。

来，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正是王安石执政，实行新法的时候。有一天张载见到王安石。王安石对他说：“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张载回答：“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①从这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之初，很想求助于张载，张载认为这次变法，“若与人为善”的话，他愿意合作，否则便反对。事实上，张载同王安石“语多不合，寝不悦”^②。因此，他想辞去崇文院校书的职务，未被批准，后被派到浙东去审查处理苗振的贪污案件。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张载以道德进，不能使之治狱”^③。王安石回答：“淑问如皋陶，犹且献囚，此庸何伤！”^④案子办完之后，回朝。此时，张载的弟弟张戡，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与王安石的矛盾尖锐，张载感到恐惧不安，于是辞职回到故居横渠镇。

对于王安石变法，张载持消极的反对态度，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顿革之”，不是“与人为善”，因此不予合作，但也不公开反对。张戡则不同，张戡在熙宁初年任监察御史，极力反对推行新法。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记载，王安石这时以青苗法能否施行而决定去就，程颢和孙觉知道宋神宗有意继续任用王安石，因而旧党人物准备暂时妥协，但由于张戡“辞气甚厉”，最后使新旧两党决裂。据司马光在《温公日录》中记载，事情的经过是：“张戡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戡怒曰：‘参政笑戡，戡亦笑参政所为事耳！岂惟戡笑，天下

①②③④《行状》。

谁不笑之者？’昉叔（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戡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①这件事情的产生，以及愈演愈烈，乃是变法与反变法，新党与旧党尖锐斗争的结果。张戡“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章数十上，又诣中书争之。”^②足见，张戡对王安石变法是何等反对！张载虽不象张戡那样，但在张戡与王安石的激烈斗争中，无疑是赞同、偏袒张戡的。因为他们既是兄弟关系，同时张载对张戡的德性、才能和政治主张都极为赞赏。“关中学者，称为二张，横渠尝语人曰：‘吾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语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忧乎？’”^③

张载回到横渠镇后，依靠家中的数百亩地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人不堪其忧”，但他却“处之益安”。整日读书讲学，研究理论，探讨问题，著书立说。吕大临说他是：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④

他经常“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教育弟子们。他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儒家思想，杂揉他学，“故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⑤。张载经过多年的苦读思考，潜心研究，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秋天，写成了《正蒙》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正蒙”是订正

①《伊洛渊源录》卷6。张戡：《遗事》引。

②③《宋元学案》卷18《横渠学案下·张戡》。

④《行状》。

⑤《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

蒙昧之意。朱熹说：“蒙者，蒙昧未明之谓；正者，订正之也。”^①张载对《正蒙》极为重视，他对弟子们说：

“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②

张载的弟子们对《正蒙》一书非常尊崇，奉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杨时曾说：“《正蒙》之书，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以示人。”^③《正蒙》是张载的主要哲学著作，也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

张载在著书、讲学的同时，还对古代礼仪作了研究，对于婚丧祭祀的仪式都作了规定，并率领弟子们亲自实行。由于张载的提倡和实行，因此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④。他十分强调仪礼的作用，这表现出他是封建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张载讲学时，不仅态度严谨、刻苦认真，而且关心民间疾苦。他看到当时政治的黑暗和贫富不均的恶果，特别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给农民带来的痛苦。他“慨然有志于三代之法，以为仁政必自经界始”^⑤。幻想把土地收归国有，恢复井田制度，以解决贫富不均等问题，从而缓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因此他常对弟子们说：

“‘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难行者，未始不以亟夺富人之田为辞，然兹法之行，悦之者众，苟处之有术，期以数年，不刑一人而可

①《正蒙·太和篇注释》。

②《行状》。

③《杨龟山集》卷20。

④⑤《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上》。

复，所病者特上未之行尔。’乃言曰：‘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方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上不失公家之赋役，退以其私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①

据说张载曾把自己的井田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弟子们买地一块，按照古代井田制度的模式画分公田私田并存，着手试办，以证明井田制在当时是可行的。但没有试行，他就死去了。现在陕西省郿县横渠公社横渠大队崖下生产队北边的地里仍保存着两条笔直的田埂，传说这是张载及其弟子们试行井田制度、兴修水利留下的遗迹。《郿县县志》称之为“郿伯井田”，并成为郿县的八景之一。

我们说，张载主张的井田制度，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这是由于历史时代、社会条件决定的。至于张载想在一乡中试验一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根本办不到的幻想。我们知道连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年～1858年），在北美洲建立“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验都失败了。至于十一世纪的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者张载的“井田制”的试验更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张载提出实行井田制的主张，企图对大地主的土地占有起一些限制作用，这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熙宁十年（1077年），吕大防上奏章推荐张载，他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②他再次被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后因他与上级礼官发生意见分歧，加之有病，便辞职回家。中途病

^{①②}《行状》。